

潜夫

马世年

对话 新子学

两岸 新子学 系列学术对话纪实

刘思禾

新子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理念,自2012年提出后就引发了热烈讨论。近五年来,新子学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2017年10月至11月间,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王俊彦主任的积极推动下,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连同数所高校的14位学者,在台北展开了一系列新子学学术对话活动,包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淡江大学中文系举办的2017两岸新子学论坛、新子学团队与港台新儒家名家及台湾中研院经学名家座谈,以及台湾新庄学研究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在上海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新子学座谈会。参与此次系列学术活动的两岸及海外学者共70余位,分别来自30多所高校,堪称名家荟萃,这是新子学提出之后最大的一次学术对话活动。在此次两岸新子学系列学术活动中,与会学者就新子学发展的浅大问题展开建设性讨论,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也保持了相当的理论张力。

新子学认为,诸子学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原创时期的智慧,更具有经典性和生命力,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研讨中,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淡江大学中文系曾昭旭教授认为,要在道统观念下定位诸子学:儒家的道统是内在的仁的血脉,经学就是人性普遍常道,也就是人性之善。要即事言理去呈现这个普遍常道,就是史。子部就是哲学,重在凸显人生经验中的理。集部就是文学,重在彰显生活经验中的感情。无论是即事以明道,即情以明道,还是即事以明道,都是呈现人性普遍常道的方式。由此可以点出子学的定位:它是即事明道中更需体现事中之理的、更偏向于哲学的方式。诸子学要有更严谨的概念思维,更准确的概念定位,更系统的理论性,这是新子学何以成为新的定性所在。

台湾中研院林庆彰研究员认为,传统文化中经学有其权威性,和战国时期的圣人集团紧密相关,所论都是可垂教训的道理。他认为:《汉书·艺文志》里,经学和儒家是分开的,经学是六艺类,儒家是诸子类。可见在先秦,儒家和经学不大一样。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要解决经学上的问题,就要回归经典。同时,林庆彰先生也肯定了诸子学的意义,他认为:传统经学、子学之间的隔阂可以打破,就是不要刻意去立异。经学、子学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混乱的反映。假如把它们当作先秦时代的材料来看的话,虽然相互有出入,但是都奠基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论语》《孟子》今天也可以看作文字书。对于林先生回归经典的说法,元智大学黄智明先生补充说:经和子的关系,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状况,不必区分出谁高谁下,要回到经典上去理解。回归经典,不是回归经的神圣性,而是回到经典流传前的面貌。这种观点和诸子学有相近之处。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在讨论中都认为,传统经学历史悠久,地位关键,影响深远,子学也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方勇教授认为,把诸子学界定为儒学、经学之下的学问,恰恰是旧观念,有必要对此作深刻反省。他说:有儒学学者提出儒学独尊,诸子学在此理念下发展,新子学要破除的就是这种观念,要反对儒学独尊,还诸子学以本来面貌,要重视传统文化中复合多元的结构。

新子学认为,在先秦时代存在着子学现象,在此之上有必要整合提炼出子学精神。对于如何综论诸子学精神,杨祖汉教授认为:儒家的道统被视为人生日常生活中的常道,父慈子孝、兄弟弟恭,这些都是我们该学做的。儒学讲究常道、道统,新子学似乎就不能再将道统当作指导原则,其指导原则要定在道家的思想上。道家所谓的道是以无作为普遍的原则,无便是去掉,剩下一个自然而空、空荡荡的、顺应变化的生命。我认为这种普遍意义的道可以作为新子学超越的指导原则。淡江大学王邦雄教授认为,要把把握诸子百家的整体性。他说:今天我们讲新子学,是一家一家地讲还是采用其他办法?我认为可以按照《庄子·天下》篇的意思,让诸子百家回到原来的神明至王整体是一、道术整全的大传统中去,这样才能各得其所,走向文化的整合,创造美好的未来。针对杨、王两位先生的看法,台湾中山大学赖锡三教授对新子学抱有更大的同情。他借助巴赫金



的复调理论,描述一种文化主体内部就是众声喧哗的多元复调的观念。他认为:《庄子·天下》篇是在肯定还是在否定思想多元?庄子的背后没有有怨者,没有单一的概念,对语言、自我有一种批判性的反省。新子学可以承认这种多元复调、众声喧哗的范式,因而齐物观念可以成为新子学的一个范式。

新子学作为一个学术理念,首先意味着要探索一个新的诸子学研究范式。王俊彦先生认为,台湾近几十年来的学术一直偏向于西方的阐释学,现在正在整体性地回归中国传统,而大陆新子学提出的重建诸子学传统的主张,正好给大家提供非常重要的新视野,有助于丰富台湾学界的研究。在此次研讨中,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生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耀博士,对新子学研究做了回顾总结,讨论了有关新子学学术范式的若干思路。他们指出:传统思想研究关键是要回到原点,当代也正值提供着回归中国思想原点的最佳契机。身处现代语境中的当代研究者,不妨学习和继承先秦时期的原创精神与恣纵气势,汲取元典智慧,融汇当代理念,探索诸子学研究的范式和以应对时代挑战。韩国圆光大学教育大学院姜声调副教授介绍了朝鲜半岛前三国时代的诸子学。针对新子学的学术范式,台湾大学林明照教授认为,新子学在子学研究中的新,包括新的材料(如出土材料、新整理文献)、新的方法(如庄学研究中分析方法、跨文化方法)等等,这些都意味着子学研究的新方向。林先生也讨论了新子学与跨文化研究的问题,认为无论是港台新儒家还是新子学,面对东西方文化都有一种二分的预设,这种二分似乎会影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对谈,新子学作为对传统学术范式的革新,这些固有观念也是值得它去反思的。台湾中研院方方全研究员提到庄子研究中一个机会主义的方法,即无论是概念的取得还是理论的使用,只要适合所要研究的对象,无论古今中外,都可以拿来运用。由此进行延伸,方方全先生认为,子学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哲学性,子学进行多元发展,这完全正确,但哲学绝对是对是子学优异性所在。对于上面提到的新子学研究中的路向问题,赖锡三教授则提出两行的主张:新子学内部有很强的张力,一方面在回归归历史脉络,找回整体的原初语境;另一方面,我们回到两千年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在叩问古典的时候,还是应以回应时代的处境为出发点。这就有两种张力,到底是以回归历史为优先,还是以面对当下的处境为优

先,要让这两者相互转化。在谈到新子学的研究对象时,淡江大学殷善培教授从子学与四部的关系角度入手,谈到新子学的研究对象、诸子与方技之别、经子之争等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教授则认为,新子学不能满足于某一学科,不能满足于就诸子学论诸子学,跨界会通才是新子学的创新之途。浙江科技学院张峰教授认为,杂家是诸子学发展的必然,新杂家是新子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以上诸位学者对新子学研究范式的看法,方勇教授认为,首先,新子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构,要注意一种整体语境,要从根源处思考,仍旧以哲学方式去研究诸子学,可能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没有办法进行开拓。其次,在有关诸子学发展与现代学理建构的关系上,关键是不回避学科限制,在跨学科研究中找到出路,要注意研究的原理化和社会科学化。

四

在新子学如何面对西方学术这一点上,既存在研究方法问题,也存在文化立场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借助发掘诸子学传统,重构有关中国性的基本理解。关于此点,上海财经大学陈晖先生认为,新子学作为全新的也是极为重要的观念维度,对于当代国学观念的建构非常关键。韩国金陵原州大学金白铉教授认为,新子学不仅是中国哲学,也是世界性的天下哲学,可以用来开辟二十一世纪的道路。台湾中研院何芝笔(Fabian Heubel)研究员强调要面对跨文化语境的挑战。所谓跨文化就是能通古今中西之变,看到这四种文化元素在演变中的复杂交织,而这种情况和现代性结合,就涉及了所谓的混杂现代化,尤其是在中国等非欧美国家表现得更为典型。德国汉学家维托夫(Viatcheslav Vetrov)认为,新子学作为一种中国性认同的主张,同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当代学者立场并不相同,而是有其独特的观点,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视野中讨论自身的文化特质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非常吊诡的是,许多研究一方面非常依赖萨义德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严厉批判萨义德的理论。新子学可以被视作汉学主义的新选项。针对以上不同看法,赖锡三教授则提出两行的主张:新子学认为,新子学对文化传统有一个多元性的判断,同时也不放弃对中国性的坚持。故而,新子学对内部文化资源来讲是一个解放,而对外部文化资源,则意味着某种坚守。总之,新子学对于西方学术的态度是一种谨慎的开放态度,而根本上则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

五

对于传统学术与当代社会的关系问题,与会的学者们有很多讨论。东北师范大学张洪兴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所谓劣根性,新子学研究坚持以中国逻辑思考中国问题,以人本、经世致用。在讨论中,港台新儒家学者强调以学术的方式面对社会,但并不直接介入社会,其所坚持的学术研究则以儒家思想化解现代人生问题为主线。而新子学主张,先秦诸子思想的关键不在生命的学问上,而在中国早期文明建构中的基本理路上,新子学的当代探索也在这里。有学者提出,港台新儒家缺乏公共领域思考的问题,并认为新子学的关键是发掘诸子学中的治理思想,同时思考其在当代公共领域的价值。曾昭旭教授认为,不能撇开内圣来讲外王,儒家的仁学并不是思考公共领域问题的障碍,反而是开出和接纳公共领域问题的源头。王邦雄教授反对港台新儒家缺乏公共领域思考的看法。他认为,要对港台新儒家作同情的理解,港台新儒家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守护传统文化之根,努力在学术思想上应对西方挑战,并没有放弃对公共领域的责任。他以自己为例,说明数十年在民间讲学的努力,是儒学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王先生自己的诸子学研究,着力于由中国学术思考新外王说,他认为:传统思想的外王从孔孟、老庄到申韩,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不必依附西方来讲。要讲中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路。对于学术与当代社会的关系,赖锡三教授则不同意混淆二者,他认为新子学是要回到诸子时代的范式,重新解读中国文化保持其创造性。新子学认为,传统思想在文化上的功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必要提出对公共领域的新主张,这意味着要对诸子学的学术性质有一个新判断。思考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重新理解中国文明体的基本构架形态。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文明体,比如希腊、希伯来、印度等等,不同的文明体对文明早期构架的思路是不同的。要解决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要找到多元文明中的位置,放在诸子时代的语境下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因而,对于传统学术的当代使命,新子学持一种积极的开放态度。

六

在此次系列学术对话中,两岸学者体现出的开通和善意,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对当代文化建设的热忱。学者们都认识到,传统文化研究既不能封闭自守,也不能以今释古,而要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作一种会通,为建构中国文化认同提供助力。王邦雄先生说: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不是文化沙漠,让西方文化如入无人之境,我们不接受。大陆已经崛起了,我们期待大陆在世界上担当更重要的角色。林庆彰先生也谈到要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他认为:中国经典是世界特有的,外国没有的我们都没有,这个观念造成很多混淆,使我们不能够客观地思考问题。学者们都认为,新子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方勇教授在研讨中指出:先秦诸子所属的春秋战国是天崩地裂的时代,而自晚清以来,我们在政治文化等各领域所经历的动荡与革新实则更甚于斯。纵观数千年来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发展,譬犹不同大陆板块之间经由独立漂移而互相碰撞冲击,原先的矛盾只发生于板块内部,新的矛盾则会从板块内部扩张至板块之间,由单一之个体超越至彼此之关联。百年以来,中西文化之碰撞交流亦复如是。初始,西方文化及观念伴随着乱世之强势进入中国,异质文明在引起震撼的同时,也给国人带来了无所适从的茫然。时至今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我们已有能力也应该重新思考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了。新子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试图努力寻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祈愿各家各派抛弃前嫌与门户之见,一同投入到这场超越学术本身的伟大事业中来,为推进新一轮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事业共同努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王符与王充、仲长统并称东汉三贤或东汉三杰,韩愈曾作《后汉三贤赞》称赞其人,欸慕有加。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将其与董仲舒相提并论。这些评价,王符都当之无愧。

作为东汉最重要的子书,《潜夫论》在思想主张与精神品格上直追先秦诸子,继承了先秦子书的著述理想,体现出强烈的子书精神。这里所谓的子书精神,主要是就其著述当中的使命感、理想追求、现实关注、社会批判、民生关怀等而言。一句话,诸子著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匡正时弊、解除民瘼、扶倾救乱、力挽衰世,就是要救世。而这恰恰都是王符在写作《潜夫论》时所萦绕于怀而无法忘记的。

《潜夫论》的根本主张与基本命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第一,重学务本是《潜夫论》的立论之基。全书以《赞学》为第一篇,继承先秦诸子劝学的传统,以学为先、勉人向学。王符以学为智明所成,德义所建(《叙录》),认为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赞学》)。他说:虽有至宝,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同上)其勉励为学的意图非常明显。可以说,重学的思想始终贯穿全书,从而成为全书的纲领。《赞学》之后,紧跟着便是《务本》。王符主张崇本抑末、守本离末,强调富民正学,以之为治国之本。举凡贡士、举贤、考绩、班禄、论赏、交际、功赏、治边等等,都要务本抑末,慎本略末,努力在学术思想上应对西方挑战,并没有放弃对公共领域的责任。他还提出,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这已超越了道德品格的限制而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了。

第二,重德尚贤是《潜夫论》的根本主张。王符是东汉儒家思想的标志性人物,他注重德治,强调举贤,尊崇德行道义,主张选贤任能。在王符看来,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化(《论策》),因而他提出德化的主张,以之为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最理想的方式。王符坚持国以贤兴,主张任人唯贤,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反对任人唯亲,猛烈抨击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用人方式。

第三,重法明刑是王符论政的鲜明标志。王符作为东汉时期儒家的标志性人物,在服膺德治思想的同时,能够正视商、韩之论,融合德法,重法明刑,这是超越时代的进步之论。王符认为,法令是君主统治天下最重要的手段,君主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

否则就会危及国家。他面对汉末的衰世,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必须要兼秉威德,明罚勅法,德法并举,严刑峻法,以诛止杀,以刑御残。王符论法,多将其与赏罚结合起来,主张信赏必罚,厚赏重罚: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三式》)这也是他在衰乱之世的无奈之法。

第四,重民救边是王符论政的基本立场。他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扬。他说,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救边》),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这也是《潜夫论》中最具思想光芒和人文关怀的主张。在如何处理边患的问题上,朝廷有各种杂乱的声音,包括弃边这样的浅薄之论。王符激烈抨击地方长官软弱无能、节节败退、欺瞒朝廷、残害百姓的罪恶,坚决主张救边安边,边无患,国乃得安宁(《边议》);而弃边只能带来唇亡齿寒,体伤心痛的结果。如此集中地讨论救边问题,这在汉代子书中是独一无二的。

《潜夫论》中最为人所关注的,在于其中贯穿始终的批判精神。王符是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开端性人物,对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的抨击是广泛的、尖锐的。他历数当时经济、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指出,此皆衰世之务。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救治衰乱之世、改变疲败之风。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弊乱之政、浇薄之风、贪枉之吏。

东汉以盛而衰,首先是政治上的。和帝以后,朝廷自身内乱不断,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两者之间也是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断加深了东汉王朝的政治危机,政事统治上矛盾四起,一片狼藉。王符对于当时政事的诸多弊病都予以无情揭露。大凡举贤荐贤、考绩论法、法令制度、治讼赎赦以及边防军事等,皆在其中,几乎囊括东汉政令举措的各个层面。矛头所指,上至公卿贵戚,下至官吏士卒,皆在其中。其所指摘,多以今则不然,或今领起,着重用力,在广泛而深刻的批判中勾勒出东汉季世的政治乱象。

东汉王朝的败落是全方位的,不仅反映在政治举措、官僚制度上,也表现在社会风气、民间习俗上。当时的社会风俗,也是一番破败、萎靡之象,世风败坏、道德沦丧。王符对此浇薄之俗也同样予以猛烈抨击。他指

出,富豪之家多是寡廉鲜耻、为富不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由此带来社会风气的势利虚伪。

王符尤其愤恨那些侵扰百姓、祸害百姓的暗主骄臣、腐败官吏,一再批判他们肆心恣意,私近忘远,崇聚群小,重赋贓民,以奉无功,动为奸作,耗之经义,迷罔百姓,欺诬天地(《忠贵》),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考绩》)。他特别关注西羌反叛中官守的投降主义与退却行为:在羌敌面前,边地将帅官吏怯劣软弱,不敢讨击;反过来又借口防边患而盘剥民众,为发国难财而饿杀百姓,其惨状,其为酷痛,甚于蓬虐。真可谓字字血泪!

王符并不仅仅是一位冷峻犀利的批判者,他对生长于辽阔的故国故土更是充满深厚情感,因而在批判的背后,还有浓郁的家国情怀。这集中体现在两个主题上,其一是举贤之叹,其二是衰世之叹。

《潜夫论》自始至终都体现出王符思贤、用贤的思想,也贯穿着举贤之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反复提及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的斗争,谓: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潜叹》)这与《韩非子·孤愤》所说的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何其相似乃尔!其情感精神,一脉相承。思贤、用贤乃至嗟贤、伤贤也成为《潜夫论》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主题。

王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没落衰败的季世。对此,王符有着非常清醒的共识。《潜夫论》反复说:衰世,末世,季世,衰世之感始终在王符心头挥之不去。他的所有政论,都是针对这一现实而生发的。无论是改良政事,举贤贡士,还是加强法制、整肃吏治;无论是崇尚道化、矫正世风,还是救治边患、解除民瘼,都是建立在挽救衰世这个基本前提下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为何会一再做如此深刻、犀利的批判。

最后回到《潜夫论》的视角问题上。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符的成就不仅在于他对社会现实的冷峻批判,更在于他对弊政乱俗的深度剖析及提出的解决方案。他力图通过自己的主张,化解东汉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为衰乱之世分析病情、诊断病因并且开出良方。因此,《潜夫论》的视角,类似于一种医者的视角,用医者的眼光看待他所处的时代。《潜夫论》一书也多以医为喻,仿佛作者是一个医家老到、忧思愤激的医者。将《潜夫论》与《荀子》《韩非子》对读,就可以发现各自观察视角的差异。如果说,《荀子》是绵密老成、博学持重、最为老师之师者之文,《韩非子》是犀利峭拔、鞭辟入里而又惨酷少思的吏者之文,那么《潜夫论》无疑就是冷峻深刻、洞悉弊病而又心怀仁爱的医者之文,王符也就是那个直面东汉季世顽症痼疾的冷峻的医者。

(作者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符雕像

资料图片

國學